

请讲

# 给基层公务员更恰如其分的回报



▲杨禹,国家发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研究员,央视特约评论员

□讲评专家 杨禹

自从中央深改领导小组审议通过《关于县以下机关建立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的意见》,舆论场就有不小的反响,有赞成有期待,有质疑有反对。如何看待“职务与职级的并行”?本质上,这就是怎么公正评价基层公务员群体的问题。

我国的公务员队伍有700多万人,其中近七成在“县以下”。要看清给他们的回报合适不合适,先要看清他们的现状。这是一个复杂的群体——他们中有“老虎”和“苍蝇”,有“一杯清茶两张报纸过一天”,但也有兢兢业业、任劳任怨、付出远大于回报者。

在互联网舆论平台上,对“老虎苍蝇”总是放大传播,对“一杯清茶”则是习惯性嘲讽,而对“兢兢业业者”却很少有传播,更谈不上放大。久而久之,网络舆论中心地带里的“基层公务员”,就被塑造成了一个扭曲的画像。要

看清他们,得越过网络舆论场这道“选择性传播”的“坎儿”。

近500万“县以下”基层公务员的真实现状是什么呢?可以归纳成五句话:

其一,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很辛苦。千条政策、万件部署,最终归于何处,要由他们来具体落实。

其二,他们干起活来很纠结。要落实的事很多,手里的钱有限。既要发展经济,也要改善民生;既要追求效率,还要构建公平。

其三,他们受到的约束越来越严格。“法定职责必须为,法无授权不可为”,依法行政的法规约束在加码,党纪政纪愈发严格,公众监督逐渐有效。

其四,他们的收入并不高。大多数人的月收入在两三千元,在本地不同人群中属于“中低收入”,而承担的责任又属于“中高层次人才”。

其五,他们中的一些人被“官场生态”所累。个人事业面对着“金字塔式”越缩越窄的晋升空间,很容易陷于迷茫。部分地区一旦“政治生态”扭曲,更会转变为对基层公务员的沉重心理压力。

有旁观者可能会轻松地说一句,“别抱怨,不想干你自己走人啊”。这种评说可以有,但显然,不该是“国家态度”。公务员队伍是国家治理的核心团队。在一个健康的现代社会里,最优秀的人不应该都奔着公务员队伍里钻,但这个队伍也不应成为社会最优秀者的聚集地。公务员群体的文化素质、遵纪守法素质、执行能力、社会沟通能力,应居于社会人群的中间层,亦是中坚层。他们理

应获得合理的劳动报酬和职务职级晋升机会。

怎么制定并落实“基层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”,是个很严谨的具体操作问题。而怎么看待这个制度,则体现对这个群体的价值判断,现状判断和主流预期。中国社会的主流舆论应该杜绝两种极端态度——要么以一些负面事例为依据,认为整个基层公务员群体都“萎靡、低效、滥权和失职”,要么只凸显一些正面事例,而忽略对公务员队伍的正风肃纪和制度要求。这两种态度都属于盲人摸象,都是用“局部真实”简单代替“全局真实”的看问题方法。

事实上,用全面、理性、均衡的眼光来看待基层公务员群体,极其重要。给他们实事求是的责任压力,也给他们实事求是的合理回报——劳动报酬和事业进步空间,才是国家正常健康前行的需要。若不能形成理性的舆论氛围,这个好制度可能执行不下去,或可能在很多公众非常“拧巴”的一种注视下执行。

改革决策者则需要准确把握推行“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改革”的时机。试想,如果十八大之后,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一上来就先搞这项改革,先给公务员涨薪,然后再大力推动反腐高压态势和整顿作风,那么,13亿老百姓恐怕很难理解和接受。

而事实上,两年多以来,反腐倡廉已初见成效,党风政风有了积极变化,老百姓看在眼里、比较满意,在这个时候积极推动“职务职级并行改革”,次序得当,时机正好。

## 焦虑与期盼

年关将至,大街上匆匆步履中,人们暂时能放下的,是前一年的压力与无奈。但另一种焦虑或期盼,却随之而来。辞旧迎新,不是每个人都能安然享受除夕夜的阖家团聚,现实的烦心事和未来的不确定,让很多人被焦虑缠身。当然,有焦虑,才更有希望。

## “真凶”咋判?

这个春节,呼格吉勒图的父母可以过得稍微轻松点了。儿子沉冤得雪,国家补偿到位,一切都向着好的一面发展。而将儿子间接置于死地的那个“真凶”赵志红的命运,也很快就能成为“别人家的事了”。

相信很多人对这纸“意料之中”的判决书,不会产生太大兴趣,尽管赵志红所涉罪名:故意杀人、强奸、抢劫和盗窃,无一不吸引眼球,但失去了呼格这个参照系,就会变得没那么重要。无论“真凶”咋判,都已是象征意义大于现实意义。

对呼格的父母而言,之前18年的每个春节都是一种煎熬和焦虑。如今,焦虑出现在了围观者身上,正如有网友所言,“现在最在乎的,莫过于追责”。相信春节只是暂时冲淡这种焦虑,不会让它走远。

## 大蒜咋办?

被焦虑笼罩着的,还有为2000多吨从韩国退运的大蒜发愁的人们。

最新消息是,据蒜农说,有韩方人员让“去告”,甚至“去世贸组织告”,不过并没有韩方对此回应。

根据估算,这次退货将给蒜农带来1000多万元损失,对于为了做成这笔生意而大举借债的蒜农来说,到目前为止,还没有看到能过一个“欢乐年”的迹象。

在全球化日益深入人心,中韩自贸区达成实质进展的大背景下,这起争端无疑再次给乐观的人们以警醒:一纸协议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,在没有实力改变而又不得不参与其中的时候,只能遵守别人制定的规则。即便如此,也可能随时触雷。

而这只是开始,明年“一带一路”的展开,亚投行的推进,无一不涉及到国际规则的博弈,焦虑将会接踵而至,但我们没有退路,唯有迎头解决。但愿以后不再出现“大葱咋办”、“大白菜咋办”等伤农难题。

## 春晚咋看?

说春节,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就是春晚。

从认同,到质疑,到讥讽……“以不变应万变”的古训,在春晚身上并不奏效,这也让“既离不了,又讨厌它”的人们,颇有“哀其不幸,怒其不争”之感。以至于每每春节将至,“春晚咋看”成了问题。

吸取了前几年“人人找茬”的教训,羊年春节到现在为止都很低调,连大致的轮廓都不是很清楚。尽管如此,吉祥物、主持人等话题,仍被人们尽情奚落。

有网友将春晚面临的困境形容为“人们日益提高的智商与春晚不断下降的编排水平”之间的矛盾。从这个角度看,公众智商的提高势不可挡,解决的办法似乎只有提高编排水平一条路。

事实上,春晚也在年年求新求变,但时代进步了,一直被“政治导向”、“社会影响”等重压的春晚,很难完全实现人们想看到的单纯“联欢”的真面目。

于是,吐槽不可避免。这也并非是逞一时口舌之快,人们只是期待在除夕夜团聚之时,能有一场直抵人心的温馨“联欢”。毕竟,除夕夜除了看春晚,还能干什么?

本报深度记者 刘志浩

预见

且慢

# 地下室里的秘密



▲北京地下室私挖泛滥,执法人员用雷达探测查处。(资料片)

本报深度记者 龚海

“德胜门打洞哥”私挖地下室,造成了北京德胜门内大街出现18米的大坑,自家的房子毁了,邻居的房子也毁了。而这也不小心揭开了北京庞大而隐秘的地下空间。北京的地下住着两类人:继往开来的京漂,五湖四海的土豪。

租住在繁华都市里的地下室,是不少北漂都有过的经历。从外地到京城,从地下室走向地上屋,这是许多北漂者的奋斗足迹。上世纪90年代末,大量外来人口涌入北京后,北京形成了人防工程出租的高峰,并逐年递增。曾有网站盘点,孙楠、王小丫等名人,都曾有过在北京的地下室挨饿受冻的经历。

据保守估计,目前在北京地下室生活的鼠族至少过百万人。地下室虽然阴暗潮湿,但房租便宜,无论对那些初来城市打拼而囊中羞

涩的年轻人,还是对四处寻医问药的病人来说,无疑都是具有巨大吸引力的栖身之所。

不少北漂愿意在地下室内蜗居,赌的是一个未来——他们认为北京的机会更多,地下室只是人生炼狱,自己总有一天会出人头地,离开这里。

的确,都住在地下了,打拼后的生活不会比这更坏。地下室因此成为梦想的隐喻。但对另外一类人,地下室则是权力的隐喻。

北京的房价连年水涨船高,居民想要在地上扩大自己的生活面积成本实在太高,能够守着一片土地的人便将手伸向了地下。

据京城媒体报道,在北京城的东城区和西城区,四合院私挖地下室成为有钱人的“游戏”,且愈演愈烈。中介称,挖地下室,是大多数购买四合院者改造的必备选项,他们就是冲着挖地下室来的。

四合院的买家大多是外地的有钱人,但因为北京的限购政策,让他们难以在京置业,于是无限购的四合院成了他们的猎物。能在寸土寸金的北京核心区买一座四合院,并挖出地下室,对外地土豪来说,不只是一笔回报率极高的投资,更是有里有利的事。

据房产中介讲,有买家买下了四合院后便向下挖地下室。不像地上违规加盖容易露馅被查,挖地下室很私密,他们可以随意地花大价钱去建地下王宫。于是,地下有了游泳池、桑拿室、酒窖,甚至专门放雪茄的房间。

在如此被强行“突破”的地下空间里会友谈业务,自然够任性、够霸气,更符合土豪的气场。“你没有的我有”,正是这一层地板的突破,让特权思维暴露无遗,更让地下室成为权力的标配。

不少贪官都有挖地下室的“癖好”。浙江丽水市建设局原副局长邹建新就在家中专门挖了一个40平方米左右的地下藏宝室,用来存放受贿的古董字画。谷俊山落马后,也从他老家濮阳的“将军府”里查封了大量赃物,其中不少就藏在他家的地下室里。

地下室,就这样打开了观察复杂中国的两个视角:一边是寻梦者阴冷潮湿的起点,让人报以同情,不过政府多次考虑到安全,试图去关停它;一边是隐蔽的权力场,因为权力的任性,屡屡让监管难以推进,最终却让制度受伤。于是,有一种愿望是打通地下和地上的通道,另一种则是制度刚性能把地板守住。把权力关进笼子,让每个人共享出彩的机会,这或许才是地下室该有的批判现实意义。